

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 「東方主義」的再思考*

邱淑雯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副教授

摘要

本文從「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視角出發，以「南大東島島民與大林女工的雙向凝視」切入，掌握 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研究發現有三：（1）不同的島民對於女工有不同的凝視，無論是從勤奮的勞動者到省錢達人或消費者，還是從愛人到家人；反之亦然，不同的女工對於島民也有不同的回望，基本上是陌生而遙遠的，但對於蔗農家的評價普遍良好。（2）女工採藥草的技術、節省不浪費的態度、防曬護膚的好習慣，這些都成為當地人嘖嘖稱奇、學習仿做的對象。（3）女工和蔗農仍無法脫離雇主雇傭的主從關係，但雙方未必一定存在著壓迫關係；女工選擇穩定認份的相處，沒有出現什麼日常反抗的舉動，力求彼此相安無事。

關鍵詞：台灣女工、東方主義、文化匯流、文化涵化、殖民計劃

* 本文為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 NSC 98-2410-H-343-022-MY2 之部份成果。

一、楔子

1997 年盛夏，我剛剛結束在東京的留學生涯返國，對於日本和台灣兩地的複雜情緒，還在起起伏伏、難以收納的階段，卻已嗅到國內瀰漫開來的哈日偶像劇風潮，無獨有偶地，慰安婦的議題也逐漸浮上檯面，在各大媒體頻頻曝光。報紙小角落的這一則內容（林家琛，1998 年 8 月 23 日《聯合報》08 版社會傳真），顯然與當時撻伐日本軍國主義殘暴不仁的「主流論述」，非常格格不入！因此，反倒大大吸引了我的目光（粗體為筆者強調處）：

「為著一段約 50 年的誓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軍方強徵的韓國籍慰安婦李容洙，昨天穿著白色喪服，至新竹空軍基地仁愛樓前的草地，即日本自殺飛行中隊--神風特攻隊『下沙崙』慰安所的故址，以韓國「冥婚」習俗，完成她和特攻隊員長谷川的婚禮，她說，「我相信死後可以和長谷川在天上相見，結為夫妻，過著快樂甜蜜的生活。71 歲的李容洙說，1944 年她 15 歲時，在一個睡夢的夜晚，突然被日軍抓走，送往北朝鮮後，又送到中國大連、上海等地，最後輾轉來到台灣，與另四名韓國慰安婦抵達新竹市的下沙崙慰安所，當時所內共有 14 名慰安婦。

她說，慰安婦與平均年齡廿出頭的神風特攻隊員都是離鄉背井之人，異地相遇，年輕的男女很容易傾訴衷曲，因此她結識長谷川後，兩人情投意合，海誓山盟，並在長谷川出死亡任務之前，一起共度了這一生中最後、最美的 3 天。

長谷川在這次任務中一去不回，但李容洙為了長谷川終身不嫁，戰後她不斷的向聯合國人權單位及日本友人，表明要回台灣新竹找尋慰安所的心願。去年 8 月，她在中研院研究員胡台麗幫助下，抵達新竹空軍基地，但不得其門而入。

……昨天上午 10 時許，李容洙進入基地，由副聯隊長金乃傑做簡報，並經農民邱阿田的協助指認，找到慰安所故址，可惜房已拆，小山坡也已剷平。李容洙突然詢問可以舉辦某種儀式嗎？李容洙隨即拿出從韓國帶來的一對男女布偶，在白紙上寫著心愛戀人神風特攻隊飛行員長谷川與「無名仙女」的名字，放在新移植的大榕樹下，按韓國冥婚習俗，在布偶旁點起白蠟燭，上香禱告後，完成一場因戰爭而不能實現的婚約。

李容洙認為在風燭殘年的歲月，得以在昔日的慰安所前完成與長谷川至死不渝的盟約，宿願既償，立即開懷而笑，並換了洋裝，這時她認為自己已是長谷川口唱日本歌謠中的『長谷川容子』，其中長谷川是夫姓，容子是長谷川替她取的名字。……」（聯合報 1998）

從一個被殖民的韓籍慰安婦口中說出的這些話語，辛酸中帶著淒美，來台的救贖之旅，掀開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存在卻不被祝福的族群、階級、男女關係及姓氏認同。多年來，我也透過不同方式整理自己的日本情結，慶幸地是，台灣社會已經越來越開放，掙脫了戒嚴時期仇日、恨日、恐日的枷鎖，底層百姓的不平之鳴也能發聲，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驚奇論述，變得不再稀有。就在此時，沖繩，這個距離台灣最近的日本，意外地躍入了我的研究視野，「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讓我重新思考台日關係中的其他雜音，以及對於「殖民 vs. 被殖民」關係的另類看待。

二、《魚群記》中的台灣女工

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其鉅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曾提及，西方人對於異國女性的凝視充滿了東方主義，也就是「為了支配、再結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之上的一種西方形式」（Said 1999：4），譬如，書中指出法國大文豪福樓拜描述他在埃及見到許多當地的奇風異俗時，女性，是展現這些奇風異俗的重要布景：開羅市場中當眾做愛的女人、為白癡手淫的穆斯林女性、爭相接取教士尿液搓揉自己的不孕婦女……（Said 1999：150-151）。

可以看到，薩伊德凸顯福樓拜筆下的埃及女性不僅怪誕奇特，並且，她們被再現的脈絡往往都和女性的肉體、男女的性愛交歡有關。長期以來，許多文學評論家或後殖民研究者也都從批判東方主義出發，去解構強勢地位者（男女都有）¹對於他者女性（族群、階級、職業、出身、長相等方面身處相對弱勢的女性）這種扭曲地再現，本文的時空背景「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就是當時前往沖繩本島、八重山諸島、南北大東島等地的鳳罐工廠、甘蔗園及製糖廠的短期季節性台灣女工，似乎也難逃這樣被書寫、被研究、被定位的命運。

¹ Lewis (1995) 一書是以女性——譬如：Henriette Browne、George Eliot、Charlotte Bronte——而非男性藝術工作者之作品為分析對象，去挑戰男性眼中固定、單一的東方主義之眼，強調這些西方女性如何以委婉曲折的方式，參與了帝國主義論述的打造。

眾所周知地，此一時空背景曾經直接而清楚地出現在沖繩作家目取真俊的《魚群記》(1983)這部小說裡。目取真俊是 1997 年日本芥川文學獎得主，1960 年出生於沖繩縣今歸仁村，琉球大學法文學部畢業，主要作品有《魚群記》、《走在名為和平大街的路上》(平和通りと名付けられた街を歩いて)、《水滴》、《收驚》(魂込め)、《群蝶之木》等，幾乎都是短篇小說，他也常常在沖繩當地報紙發表散文，被認為是反體制的作家，作品多使用方言，發表於 1983 年的著名短篇私小說《魚群記》曾獲得「第 11 屆琉球新報短篇小說賞」。在此，必須簡介《魚群記》的內容。

時空是即將回歸日本、也就是 1972 年前夕沖繩本島北部的偏僻農村，當地鳳罐工廠林立，工廠周邊河川群聚了 Tilapia 這種外來低等的臭魚，戲弄這些魚群的少年也結集成群，鳳罐工廠內的台灣女工、覬覦女工的沖繩男人等，又是不同的群聚。換言之，魚群並非單指 Tilapia 這種魚類而已，作者運用擬人法 (personification)，從動物隱涉到少年、女工、男人等不同性別、階級、種族的群聚，也把 Tilapia 暗指沖繩，象徵回歸日本之前的歸化魚類，並把自己的童年經驗及對台灣女工的追憶編入素材，串連出一部個人色彩濃厚的私小說 (西成彥 2003)。《魚群記》是以少年的第一人稱來做鋪陳，文中和女性的肉體、男女的性愛交歡有關的情節包括了：這些女工被沖繩人蔑稱做「台灣女」(いなぐ)，許多沖繩男性仍擺出殖民時代對台灣人的歧視，在女子宿舍外窺伺、徘徊與勾搭；故事主角的少年常跑到河岸邊的鳳罐工廠遛達，無法抑制對台灣女工細白肌膚的垂涎與不斷擴大的性幻想，後來暗戀某位女工，混到工廠或宿舍外想和她親近，竟然發現她和自己的父親有染……。²

那麼，後人又如何從批判東方主義或後殖民的脈絡，去解構《魚群記》中被再現出來的台灣女工呢？分別從日、台雙方兩位學者西成彥 (2003) 及朱惠足 (2001) 的觀點來看。

西成彥 (2003) 認為《魚群記》凸顯了沖繩人對台灣人的鄙夷，以及台沖雙方不平等的對待關係，作品透過少年對台灣女工性愛的寄託與想像，將沖繩男性和少年們擺在一個「加害者、歧視者、榨取者」的位置，算是「沖繩版的東方主義」。³後來，該書作者目取真俊在《沖繩：草之聲・根的意志》(2001)

² 筆者於 2011 年 1 月中旬前往沖繩石垣島，訪談了台灣移民、1960-1970 年代在鳳罐工廠管理過台灣女工的當地人及滯留下來的台灣女工 (邱琮雯 2011b)。

³ 東方主義不僅存在於西方世界，也普遍存在許多國家地區，除了這裏所指「沖繩版的東方主義」外，也有「冷戰時期黑人東方主義」(Cold War Black Orientalism)，這

中也坦承，透過《魚群記》的書寫讓他反省到，沖繩不再只是大日本帝國壓迫底下的受害者或被歧視者，對台灣女工而言，沖繩儼然成了加害者和歧視者。由此觀之，1879 年琉球被日本併吞後，「日本—沖繩—台灣」三者間的位階差序，並沒有隨著 1945 年日本殖民台灣的結束而告終，仍舊牢不可破地持續到戰後沖繩引進台灣女工的 1970 年代，透過小說中男女性愛、族群、階級盤根交錯的結構化，這種後殖民脈絡下的不平等關係更為糾結、也更為深刻。

然而，朱惠足（2001）提出了相似卻不盡相同的觀點，她著眼的是《魚群記》中沖繩男性對台灣女工細白肌膚的垂涎，以及隨後所引發的一連串反應。女工的細白肌膚彷彿是包裹著毒藥的糖衣，她們純粹是來賺錢的短期移工，但她們的現身，攪亂了當地純樸的民風，女工成為男人情慾投射的對象，夜夜在女工宿舍外徘徊的男人絡繹不絕。朱運用後殖民理論大師巴巴（Homi K. Bhabha）解構種族主義與膚色的手法，認為台灣女工細白肌膚的現形，其實並非鞏固，而是破壞了「日本—沖繩—台灣」三者間既存的位階差序。因為 1895 年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在許多沖繩人的眼裡，是一個充斥武裝暴動、傳染病、獵人頭等動盪不安的化外之地，台灣順理成章地被沖繩人當成是一個替代，替代了沖繩這個老是被日本人視為落後於日本其他區域的邊境。朱從女工的細白肌膚切入，指出長久以來，沖繩人被日本人歧視的外顯特徵就在於膚色，沖繩人把對於己身膚色黝黑的自卑，轉化成對白皙肌膚的妒嫉、渴望與羨慕。台灣女工的出現，特別是她們的細白肌膚，正好顛覆了沖繩人對台灣的想像，打破了沖繩人長年以來認為沖繩優於台灣的看法，更翻轉了沖繩人對台灣的嚴重偏見：台灣替代了沖繩，一個落後於日本其他區域的所在。

西成彥、朱惠足都是以後殖民的觀點解構「台灣女工在沖繩」此一現象，確實有助於瞭解台沖之間不平等關係底下女工處境的無奈，然而，台灣女工的出現，到底是如西成彥所說的，再製了「日本—沖繩—台灣」三者間既存的位階差序，還是如朱惠足聲稱的，其實它是顛覆了三者間的位階關係呢？答案可能依觀察者的見仁見智。真實世界乃森羅萬象、詭譎多變，如同前述韓籍慰安婦李容洙的真情告白一樣，慰安婦與神風特攻隊隊員的惺惺相惜，其實已超出了國族、階級、殖民等固定疆界的劃分脈絡。準此，筆者也希望跳脫小說《魚群記》的文本世界，還原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尋找台灣女工與沖繩人之間其

是批判 1950 年代占領期的日本國內黑人美國士兵與日本女性之間性愛關係的相關論述（岡田泰弘 2009）。

他可能的凝視與互動。近年來，確實已有不少先行研究試圖以更多樣、變動、辯證的方式，處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宗主國與殖民地雙方的相互關係，筆者稱之為「東方主義的再思考」，本文即以這個視角切入，去捕捉曾經存在、卻未被發掘的台沖關係。

三、東方主義的再思考

在闡述本文所指「東方主義的再思考」到底為何之前，必須先說明以下兩者的區別：一是東方主義做為一種學術範疇或專門術語，意指「西方對於東方壓迫性再現系統的知識體系」；另一是冠上書引號，專指薩伊德的著作《東方主義》，也就是批判西方綿延數千年來的東方主義之名著。但《東方主義》自從 1978 年問世以來，即伴隨了海內外各家學派不斷的批評與反省，針對其方法論、認識論或是假設前提、資料來源等，都有人提出不同的見解，薩伊德也陸續予以回應或反駁。（宋國誠 2003：407-427；Kennedy 2003：42-103）然而，東方主義與《東方主義》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傾向以二元對立、宰制與被宰制的固定視角作為論述的前提。因此，配合本文的時空脈絡及前述的問題意識，筆者在使用「東方主義的再思考」時所指涉的是：如何超越東方主義與《東方主義》兩者中隱含的二元對立、宰制與被宰制的固定視角，如何以更多樣、變動、辯證的方式，處理（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原）宗主國與殖民地雙方的相互關係。

春日直樹在其編纂（1999）的《大洋洲·東方主義》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薩伊德批判東方主義的知識觀點確實強而有力，但《東方主義》只注意到西方具高度宰制性格的種種文化論述，卻嚴重忽略了這些文化論述如何被非西方人或被殖民者所解讀、詮釋，換言之，它漠視了被宰制者的反應或反饋，沒有顧及被宰制者回應時所依存的那個文化體系及其價值，更遑論去關注宰制者與被宰制之間互動、協商、交涉的複雜過程。

譬如，收錄在該書當中，研究大洋洲殖民地文化的人類學家 Nicholas Thomas（1999）所寫〈美好的以及被詛咒的事物〉（*美しきものと呪われたるもの*，原文：The Beautiful and Damned）一文就指出，研究「西方人對於非西方人的再現」之先行成果已經很多，這些研究的共同點也是盲點是在於，歐洲人自以為對異文化的理解是「正知正確」的，以為異文化都是「容易理解」的，在多數歐洲人眼中，所謂的異人幾乎等同於野蠻的、未開化的。翻開18、

19世紀以來，西方人對大洋洲原住民的再現歷史，大抵是在「高貴的野蠻人vs.卑野的土人」兩端間徘徊，也就是說，這種再現方式排除了對原住民的其他可能理解。所以，Thomas主張去承認原住民是善惡兼具、既高貴又野蠻，以及存在了「各種不同原住民」與「各種不同西方人」頻繁交會的這個事實。

同樣地，Mary Louise Pratt (1992) 的《帝國之眼：旅遊書寫與文化匯流》(*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也出現類似的看法，該書提出接觸區 (contact zone) 此一概念，是指各種文本互為指涉的場所，也是強弱懸殊文化互相激盪之地，該書以1750-1980年的西方遊記為文本，主要處理的議題是：他者如何被再現，以及被再現之後的他者意象如何被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 流用的曲折過程。該書注意到殖民地與宗主國接觸互動後所引發的一連串文化匯流 (transculturation) 現象，以及異文化接觸時相互感染的變動過程。譬如，Pratt強調來自被殖民者及原住民的反抗或反應，但她也批判非洲和南美的被殖民者深受宗主國所打造的他者意象之影響，並經常以此意象做為自我認同的基礎來源。

除了曾被西方殖民的大洋洲之外，殖民主義與殖民文化所帶來的影響，從15世紀後的歐洲開始向外蔓延，到了19世紀末葉，日本也成為亞洲的殖民宗主國，關於日本的殖民史與殖民經驗的諸多研究裡，也出現了上述相似的觀點，在此，以曾經被日本統治和殖民過的密克羅尼西亞之馬里亞納群島 (Mariana Islands)、韓國的巨文島兩地之先行研究來做說明。

飯高伸五 (1999) 引用了前述 Nicholas Thomas (1994) 在《殖民文化：人類學、旅行與統治》(*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一書中所提出的「殖民計劃」(colonial project) 這個概念，這是指在殖民狀況底下，如何超越「殖民者 vs. 被殖民者」二元對立的簡化關係，而去著眼各別行為者在不同歷史社會狀況中的應對、操演與實踐。Thomas 分析了殖民地時代斐濟境內各式各樣的行為者，包括：殖民地高官、宣教士、人類學家、攝影師、當地原住民等，他們彼此之間存在了複雜矛盾、相互再現的關係，這些行為者的共同實踐與交錯，才編織出所謂的殖民地文化。更重要的是，Thomas 強調他們雙方的關係不能被視為單純的「壓迫 vs. 抵抗」而已，倒不如看成是超越「壓迫 vs. 抵抗」以外的相互實踐，有的背叛、有的忠誠、有的選邊站。在 Thomas 的「殖民計劃」這個基本概念下，飯高分析了日本於1914-1944年統治密克羅尼西亞的馬里亞納群島期間行政官員、企業家、日本

移民、原住民彼此的權力折衝與利害糾結，從這四種人的不同身份、立場與利益考量，去論述當地製糖業的發展過程。

此外，崔吉城主編（1994）《日本的殖民地與文化涵化：韓國·巨文島》一書，也承續了近似的看法，巨文島位於濟州島的東北方，島上的民俗文化、漁業、教育、祭祀宗教、外來語（日語）深受日本的影響，日韓兩國人民的互動關係也非常密切。崔吉城認為，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觀點比較有助於瞭解外來文化從傳入、接受、變化乃至創造的整體過程，它是指兩個不同的文化接觸後，經過一段長久時間，兩者相互採借適應，彼此都產生變化的現象。由此出發，該書定位巨文島研究的特色是：從強調殖民者對殖民地的單向控制或同化，轉為殖民地對殖民主的逆向影響或回應，包括島民對日本人的抵抗、屈服，以及彼此之間的融合、競爭等詭譎多變的人際往來。

綜觀以上各家論述可以窺看出，它們共同著眼於：如何超越二元對立、宰制與被宰制的固定視角，主張以更多樣、變動、辯證的方式，處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宗主國與殖民地雙方的相互關係。準此，本文從「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問題意識出發，希望凸顯 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一言以蔽之，這些女工的某些身影確實和《東方主義》、《魚群記》書中的描繪相仿，與女性的肉體身體、男女的性愛交歡有關，仍被置於充滿權力宰制的不平等關係裡，然而，有的身影則與權力位階差序並無太大關連，它們是自然而然地被鑲嵌在「被殖民者 vs. 殖民者」、「送出國 vs. 接受國」、「雇傭 vs. 雇主」、「女 vs. 男、女 vs. 女」等國族、族群、階級、性別組合的天羅地網中，共同打造出台灣女工在沖繩諸島的可能形貌。換句話說，從「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面向切入，本文希望有別於「加害者、歧視者、榨取者」vs.「受害者、被歧視者、被剝削者」二元對立的論述方式，並且，不再只由沖繩單方、片面地再現台灣女工，也不是以女工的有限記憶重返當時的時空，而是把握台沖兩方的雙重視角，交叉地瞭解彼此的凝視與互動，以捕捉曾經存在、卻未被發掘的台沖關係。

本研究的對象是沖繩縣南大東島上的台灣砍蔗女工，接下來就分別從「引進台灣女工的背景：從缺工到補工」、「南大東島島民眼中的台灣女工」、「台灣女工回望的南大東島島民」三個面向去鋪陳。首先，「引進台灣女工的背景：從缺工到補工」是以接受國沖繩的脈絡，掌握台灣女工之所以出現的時代背景；⁴接

⁴ 關於送出國台灣方面的時代背景，特別是「中琉文化經濟協會」主導下的移工派遣業

著，進入本文的主軸，描述和分析「南大東島島民眼中的台灣女工」與「台灣女工回望的南大東島島民」，在「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視角底下，它們到底呈現出什麼樣的意涵。

四、引進台灣女工的背景：從缺工到補工

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沖繩，不僅從台灣，也從菲律賓、韓國、印度等地引進所謂的外勞，在美軍基地、甘蔗園、製糖廠、鳳梨工廠、伐木場、建築工事等地方工作。引進外勞並非完全沒有限制，美國管轄期間（1946-1972 年），是以琉球列島美國政府的立場加以認可，隨著 1965 年 9 月〈非琉球人雇用相關規則〉（非琉球人の雇用に関する規則）此一法案的施行，改由沖繩人民自治機構下的「琉球政府勞動局」負責統轄沖繩以外地區勞工引進之事宜。1972 年 5 月沖繩回歸日本之後的 5 年內也就是直到 1977 年，仍依據 1971 年 12 月底公布的〈沖繩復歸特別措施〉（沖繩の復歸に伴う特別措置法）繼續引進外勞。與本文最有直接相關的當屬在甘蔗園、製糖廠、鳳梨工廠等地工作的外勞，從缺工到補工，先要說明的是，為什麼沖繩缺乏這些工人，也就是造成缺工現象的原因到底為何。

外村大、羅京洙（2009：79-80）曾研究 1972-1977 年這段期間沖繩地區的短期季節性韓國外勞，依他們兩位的看法，外勞之所以會出現在這些地方，與其「工作性質」及「勞力市場的供需狀況」有密切的關連。

先以工作性質來說，甘蔗和鳳梨這兩種作物都無法長期保存，無論採收或加工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加上砍蔗工作乃極需體力、耐力的重度勞動，鳳梨工廠的薪資又非常低廉，這些工作幾乎很難找到當地人願意從事。之前大多從農村人口中調度，然而，隨著工業化、都市化及商業化的發展，離農（retirement from agriculture）現象開始出現，許多農村人口紛紛往薪資較高的沖繩本島或日本本島去工作賺錢。昭和 40 年（1965）左右的日本，正是所謂昭和元祿的時代，也就是昭和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對外貿易不斷擴大，國內各項大型建設紛紛展開，是工業生產擴張的黃金年代，大阪萬國博覽會會場的基礎建設，迎接自用車時代來臨而興建東名、名神高速公路，以及民間各地的住宅建築等所有工事，都大量吸收了來自全國各地農村的勞動力，也包括沖繩本島和離島的勞動人口。那時沖繩的本土產業不甚發達，就業機會也有限，比

務，已於邱淑雯（2011a）中詳述。

較重要的只有甘蔗和鳳梨兩大產業，但是，鳳梨工廠通常是在沖繩本島北部或石垣島等栽種鳳梨的農業地帶，甘蔗園或製糖廠也位於南北大東島等離島或是本島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區，在地利條件不佳的因素下，這些產業既已無法留住農村人力，更遑論吸引其他地區或都市人口來此工作。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沖繩縣南大東島上的台灣砍蔗女工，故先以大量引進台灣女工的「製糖業」和「蔗農」為例，說明它們如何面臨缺工、又如何進行補工的具體措施。

根據當時沖繩頗具知名的製糖公司「第一製糖株式會社」社史《第一製糖株式會社 20 周年記念誌》（1980）的資料，1965 年製糖期間還出現不少潛在的失業者，很多當地人自己會跑來糖廠求職；但到了隔年，製糖廠卻面臨連短期季節工都招不到的窘境，勉強找來的臨時工素質低落或參差不齊，對於製糖期間的廠務運作，已經造成影響。因此，第一製糖株式會社社長決定，直接向琉球政府行政主席陳請，希望准許開放台灣勞工前來，以下是社長在昭和 43 年（1968 年）5 月 31 日所寫「關於製糖廠雇用非琉球人季節工」的書信大要：

「本社之前遭逢前所未有的勞工短缺，面臨慢性的勞力不足，多次被迫歇業，即便如此還是苦撐下來了。製糖業人手不足的原因，不僅出在本地勞動人口總數不足，也與製糖期間過短、製糖業屬季節性工作等特質相關。製糖廠的臨時工人，通常等製糖期間一過又成了失業者，或得再轉到其他職場去當臨時工。這對深受貿易自由化以及國際糖價影響、並高度要求合理化經營的製糖業來說，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可以預見，明年製糖期間勞力不足的現象只會更加嚴重，因此，個人由衷地懇請，准予本社從台灣引進具有經驗的製糖工人，以確保製糖期間的勞力無缺無誤，同時，本社也將盡力維持本地季節工人的水準，並提高其勞動意願，敬請查照。」（第一製糖株式會社 1980：192）

可以看到，該陳請書中明白指出，造成製糖業缺工問題嚴重的原因，除了勞動人口總數不足外，還加上製糖業本身「短期的、季節性的、臨時的」勞動特質使然，這些都使得當地的招工變成困難重重，於是，引進台灣移工成了不得不的替代方案。（表 1）是 1966-1972 年期間，沖繩地區重要製糖廠引進台灣移工人數一覽，移工有男有女，整體而言，女多於男，移工的勞動內容分成兩類，製糖廠的廠內勞務和蔗園的砍蔗勞務，女工多集中在砍蔗勞務，男工則是廠內勞務。

除了製糖廠的廠內勞務需要女工外，蔗農經營的蔗園之砍蔗勞務更需要女工。創立於 1958 年，號稱是沖繩地區唯一、也最具代表性的圖文月刊新聞雜誌《沖繩影像》（オキナワグラフ）曾報導過當時的台灣女工，1970 年 5 月號該刊以「砍蔗就交給她們吧！勤奮的台灣季節工」為題，描繪來自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人、外省退役軍人、本省人在沖繩本島南端東風平村砍蔗的日常生活。「勞動者」是台灣女工被該刊最主要再現的身份，當地蔗農工會的金城組長坦言，之所以引進台灣的砍蔗工人是因為，台灣工人一天的勞動時間長達 10 小時，每人每天平均砍收 1 噸的甘蔗，比起沖繩人只能砍 0.6 噸真是強多了，對台灣砍蔗工人旺盛的勞動意願深感佩服，對其勞動成果更是滿心歡喜。

五、南大東島島民眼中的台灣女工

筆者在 2010 年 2 月初前往沖繩調查之前，已於 2006 年 5 月到 2009 年 12 月底，陸續在嘉義縣大林鎮訪談了多位高齡的女工，她們都是在 1960-1970 年代透過仲介、親友或是鄰里熟人的口耳相傳，從大林前往南大東島當砍蔗工。⁵也因此，筆者決定依尋這些受訪女工的足跡，實地前往該地一看究竟，希望從南大東島島民對於台灣砍蔗女工的口述回憶裡，追溯她們如何被當地人凝視以及與之互動的情形，進而描繪出她們的可能身影。在此，必須簡述的是：南大東島的糖業發展、製糖業勞動人口短缺和引進台灣女工的背景。

南大東島位於沖繩本島 4 百公里的東方外海，地處北緯 25 度 50 分、東經 131 度 14 分，面積約 30.57 平方公里（圖 1），自古以來琉球人稱之為「ウフアガリジマ」，琉球方言就是東方離島之意，但直到 17 世紀前半，它才出現在歐洲人繪製的地圖上，明治 18 年（1885 年）日本命令沖繩縣對大東諸島（南大東島、北大東島、沖大東島）進行探勘，大東諸島才正式劃入日本國沖繩縣的管轄。南大東島最重要的開拓者是八丈島出身的富商玉置半右衛門（1838-1910），他於明治 31 年（1898 年）視察夏威夷、東海、菲律賓、琉球群島，當遠洋漁船作業出到琉球時發現了南大東島，遂雄心壯志地開展對這座無人島的開發，特別是糖業的開發。南大東島的開發和糖業幾乎可以劃上等號，二次大戰結束前，掌控南大東島製糖業及行政自治權的就是玉置家族所屬的玉置商會，後改名為東洋製糖及大日本製糖。簡言之，當時該地是日本政府行政

⁵ 關於嘉義大林 8 位砍蔗女工的離返經驗與性別規範之間的關係，已於邱琄雯（2011a）中詳述。

權限無法到達的偏遠離島，島上的自治權幾乎由製糖會社一手操控，是名副其實的「社有島」（會社所擁有的島），除了少數管理階層的公職人員外，島民幾乎都是製糖會社所屬的蔗農，島上的店家、學校、郵局、交通也都由會社所把持及營運。1946 年美軍開始統治沖繩，擺脫由製糖會社操控全島的壟斷局面，1950 年改名成立大東糖業株式會社，直到現在仍是南大東島最主要的產業。⁶



圖 1、南大東島位置圖

資料來源：沖繩情報うちなーぐちフェスタ。⁷

研究沖繩離島經濟與人口移動的平岡昭利（1978、1992）曾提到，南大東島的糖業生產是以「當地人口的流出」與「外籍勞工的流入」這兩股相反形態所構成，製糖業勞動人口短缺的問題，在南大東島特別嚴重。究其原因，除了當地勞動力人口向外流出、地處偏遠、又是海中孤島等諸多不利條件外，還須考量的是：該區蔗園耕地面積非常廣大這個因素。1970 年代初期，南大東島的蔗農數約有 312 戶，總耕地面積 1,905 公頃（1 公頃=1 萬平方公尺），平均每

⁶ 南大東島的相關情況可參考：<http://ja.wikipedia.org/wiki/%E5%8D%97%E5%A4%A7%E6%9D%B1%E5%B3%B6>（2009 年 5 月）。

⁷ 詳情請見該網站之「沖繩全域地圖」：<http://www.uchinajoho.com/okinawa/okinawaichiran/okinawamap/index.htm>

戶面積約 6 公頃，而當時全沖繩平均蔗農的耕地面積只有 76 公畝（1 公畝=1 百平方公尺），可說是天壤之別。且南大東島平均每戶蔗農的砍蔗收入約 230 萬日元，但超過 3 百萬日元的蔗農就有 60 戶，幾乎佔了全數的 20%。可以想像，在甘蔗採收尚未機械化的年代，人手不足確實是一個每年都令蔗農憂心不已的問題，最直接的影響是，不得不拉長甘蔗採收的時間，甘蔗採收通常是年底到隔年的 5 月份左右，但因人手不足採收延長至 7 月的話，甘蔗的甜味會變薄，也減損製糖的品質（沖繩タイムス 1973）。

南大東島的人口數是 1,405 人（2010 年 3 月），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 46 人，⁸島上最多時曾有 2 千人左右居住，早年每當製糖期人力缺乏，蔗農代表得為了「勞務募集」而四處奔走，從沖繩本島或是久米島、伊是名島、宮古島等附近離島招攬工人以解決當地的缺工問題。1966-67 年左右開始從台灣引進工人，男女都有最多時曾超過 7 百名，主要是製糖期的砍蔗女工，（表 2）一直到台日斷交的 1972 年為止，但之後仍有台灣工人以偷渡方式或觀光簽證的名義前往南大東島工作。⁹

表 2、1966-1972 年南大東島製糖業勞力概況

區 分 性 別 年 代	自家勞力		國內勞力		台灣勞力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計
	1966-1967	353	148	340	6	33	353	726	507
1967-1968	303	140	227	16	17	528	547	684	1,231
1968-1969	274	116	141	13	23	671	438	800	1,238
1969-1970	251	114	59	4	43	685	353	803	1,156
1970-1971	243	142	53	4	95	487	391	633	1,024
1971-1972	239	146	42	1	21	415	302	562	864

資料來源：南大東村誌編集委員會（1990：556）。

2010 年 2 月初，筆者從沖繩縣首府那霸市飛抵南大東島進行調查，訪談了許多和台灣女工有過直接接觸的當地人（表 3），包括：曾經雇用台灣女工的

⁸ 南大東村詳情請見：<http://ja.wikipedia.org/wiki/%E5%8D%97%E5%A4%A7%E6%9D%B1%E6%9D%91>（2010 年 4 月）。

⁹ 南大東島的受訪者菊池是島上唯一的台灣媳婦，嫁過來時是 1980 年，因有人密告台灣女工 15 人偷渡來砍蔗，她曾被警察找去當問訊時的翻譯。

蔗農及其子弟、管理台灣女工及蔗農雙方的勞務對策委員、負責招募台灣女工來島的勞務募集委員、做台灣女工生意的店家老闆娘、間接聽聞台灣女工軼事的島民（如糖廠員工及村史編纂者）等 19 位報導人。除了和明、千惠光、菊池太太、金城 4 位是後來「間接聽聞」台灣女工的軼事外，其餘的人都和台灣女工有過「真實接觸」，因此，透過他們的回溯，筆者可以更貼近地掌握島民與台灣女工的互動，並從這些互動經驗的擷取，捕捉他們彼此的可能關係。

表 3、南大東島受訪者一覽

化名	性別	年齡	和台灣女工的連接
幸地	男	89 歲	村議會議員、勞務對策委員，到台灣 8 次招募女工。蔗農，家中雇用台灣女工。
新城	男	67 歲	蔗農，家中雇用台灣女工。
沖山	男	近 60 歲	蔗農子弟，家中雇用台灣女工。
和明	男	49 歲	寫南大東島村史時，聽說台灣女工到海邊揀野草。
千惠光	男	約 49 歲	糖廠員工，耳聞糖廠雇用台灣女工。
淺沼	男女（夫婦）	約 76 歲	蔗農夫婦，家中雇用台灣女工。夫為勞務募集委員，曾到台灣 2-3 次招募女工。
奧山	男女（夫婦）	70 多歲	電器行兼賣藥的夫婦，台灣女工來店裡買東西。
伊佐	男女（子母）	63 歲	蔗農子弟，家中雇用台灣女工。
		85 歲	蔗農，家中雇用台灣女工。
菊池	男女（夫婦）	58 歲	蔗農子弟，家中雇用台灣女工。
		57 歲	島上唯一台灣媳婦，耳聞各蔗農雇用台灣女工。
正子	女（母女）	76 歲	商店老闆娘，台灣女工來店裡買東西。
涼子		50 幾歲	商店老闆娘的女兒，台灣女工來店裡買東西。
金城	女	54 歲	無，民宿業者，瞭解各報導人之背景。
典子	女	52 歲	蔗農子弟，小時家中雇用台灣女工。
羊子	女	50 幾歲	蔗農子弟，小時家中雇用台灣女工。
輝子	女	約 50 歲	蔗農子弟，小時家中雇用台灣女工。

說明：依男／女年齡順序排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此，必須交代一下筆者於南大東島的訪談過程以及訪談資料的取得方式。由於南大東島面積不大，人口稀少，只有千人出頭，目前仍以製糖業為主，要鎖定「和台灣女工曾經有過真實接觸的島民」並不困難，筆者從民宿業者金城太太的介紹開始，順利地以滾雪球方式陸續找到受訪者。他們對於我的到來，

大多表示歡迎、驚奇和些許的懷念，畢竟，對這些島民而言，看過「台灣女工的身影」已是 3、40 年前的陳年往事了。我一開頭的詢問總是：「您對台灣女工留有什麼印象？」盡量先讓受訪者自然流露、侃侃而談；途中，會提及台灣女工和韓國女工的比較，這不是刻意製造台韓的二元對立，而是為了更瞭解島民眼中台灣女工的特質而加入的設問；之後，針對男性受訪者，會穿插對台灣女工有無性幻想之類的話題，針對女性受訪者，也會問到是否耳聞女工與當地人或其他男工的情事。

從受訪者的口中清楚得知，台灣女工的身影絕不只是「女工」二字而已。以蔗農家來說，他們和女工的日常接觸最多，農家無法事先挑選女工，不知她們的來歷或素質，只能事先依自己蔗田面積大小及預估當年收穫量多寡，提出申請所需的砍蔗工人數，然後再等分配到各戶農家。他們眼中的台灣女工是多樣且參差不齊的，包括：年輕或年長、已婚或未婚、討蔗農家喜歡或不喜歡、砍蔗技術好或不好、抱持不同動機前來等，各色各樣的人都會存在。¹⁰

重要的是，回到「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問題意識，去凸顯 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時，是否有及到底有哪些身影和《東方主義》、《魚群記》書中的描繪相仿，與女性的肉體身體、男女的性愛交歡有關，仍被置於充滿權力宰制的不平等關係裡？

的確確，台灣女工是不少當地男性愛慕垂涎的對象，特別是未婚、年輕又稚嫩的女工，和男性發展出不尋常關係時有所聞，譬如，被男屋主誘騙到房間強暴，和其他男工或當地男性有曖昧行為，有的還因懷孕中途被遣送回國。淺沼一邊回想一邊忿忿不平地抱怨，少數女工晚上會偷偷跑出去約會（還是賣春也不知道），第二天當然沒體力砍蔗，對蔗農家而言也算是損失。新城從一開始受訪就非常大方地承認，他對台灣女工極具好感，當時他也年輕又單身未婚，女工有的才 17、8 歲都很不錯，某些女工會主動對他示好，生病時在身旁照顧他，甚至也和她們接吻或發生男女關係，但又很怕她們懷孕，可惜的是，終究沒有和台灣女工成婚。年過 60 歲仍一派瀟灑、散發熟男魅力的伊佐，家中雇用台灣女工時，他已經是 20 歲的成年男子了。他說男工們主要負責搬運，他

¹⁰ 「砍甘蔗」雖是台灣女工出國的名義，但似乎也有人抱持「其他動機」來南大東島，蔗農子弟的伊佐就不諱言地指出，曾發生已經在台灣懷孕的女工，隱瞞自己的孕身渡海而來，然後在島上生下小孩，他認為這個女工出國目的可能是為了賺錢，也可能本身對外國有些嚮往。有少數年輕未婚不太會砍蔗的女工，她們來此的動機令人好奇，或許想出國見識見識，不會砍、不想砍、每天哭哭啼啼的人也不是沒有。

也得一起幫忙做，比較需要耐力而非體力的砍蔗則由女工從事；放假時他得負責開車送女工們去街上看電影，大家都很开心。他不諱言地坦承，當時自己已經有要好的女朋友，但還是會對這些台灣女工有點興趣，甚至產生某些無可厚非的性幻想。

然而，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除此之外，女工又有哪些身影與權力位階差序並無太大關連，而是自然而然地被鑲嵌在「被殖民者 vs. 殖民者」、「送出國 vs. 接受國」、「僱傭 vs. 僱主」、「女 vs. 男、女 vs. 女」等國族、族群、階級、性別組合的天羅地網中呢？

筆者從訪談資料中整理出：「稱讚被殖民者」、「向被殖民者學習」、「和被殖民者的家人情誼」這三點，試圖趨近島民凝視及互動下的台灣女工。之所以用「被殖民者」而非「女工」這個字詞，是因為：（1）「被殖民者」一詞較能涵蓋不同島民眼中不同的女工身影，如前所述，所謂的島民就是 19 位報導人，包括了曾經雇用台灣女工的蔗農及其子弟、管理台灣女工及蔗農雙方的勞務對策委員、負責招募台灣女工來島的勞務募集委員、做台灣女工生意的店家老闆娘、間接聽聞台灣女工軼事的島民等人，他們眼中的女工身影則涵蓋了勞動者、省錢達人、消費者、愛人、家人。（2）更重要的是，本文旨在從「東方主義的再思考」此一視角，去凸顯 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因此使用「被殖民者」一詞，更能傳達出與殖民者（島民）之間權力關係的轉換及變動。

（一）稱讚被殖民者

南大東島的所有受訪者都異口同聲地稱讚，台灣女工砍蔗技術精湛，從早到晚勤奮努力、任勞任怨。近耳順之年、當時也才還不滿 20 歲的蔗農子弟沖山，就對台灣女工的砍蔗技術讚譽有加。他觀察到台灣女工砍蔗時，多從甘蔗莖部的下半段一刀砍下去，對蔗農而言，這才算是「技術」！但從宮古島來的日本女工，則從莖部的上半段剝斷，因為這樣操作容易，但對蔗農而其實是損失，當時因普遍人手不夠，農家也不好吭聲。台灣女工 1 人一天平均可以砍到 1 噸的甘蔗，日本人頂多只砍 0.5 噸，效率真的很驚人。

此外，和 1972 年台日斷交後引進的韓國女工相比，¹¹更能凸顯出島民眼中

¹¹ 1972 年 5 月沖繩回歸日本，同年 9 月日本和台灣斷交，無法再引進台灣移工，1972 年之後的 5 年期間，沖繩曾招募韓國移工前來，但因首爾和那霸之間的機票昂貴，且韓國移工不像台灣移工熟悉採收技術，發生許多事故、衝突。沖繩縣知事一度想再招

台灣女工做為一名「勤奮的勞動者」之價值所在。

首先，「勤奮」勞動者的重要形象之一就是「很少休息」。滿頭捲髮、宛如相撲選手的菊池是蔗農子弟，家裡曾雇用過台灣女工，他立刻從舊衣櫃中找出泛黃的黑白照片，那是 4 名台灣女工和 1 名台灣男工出遊的合照。拍照的人可能是其姐夫，他特別強調，台灣女工幾乎不玩、也不想玩，只在回國前夕、農曆春節、糖廠洗機械休工時才有空出來，應該就是那時候拍下的這張照片。

沖山回憶台灣女工都很拼命，從早到晚，下雨天也穿著雨衣出去砍蔗，一方面她們熟悉工作的內容和技術，主要還是目的清楚，就是為了賺錢而來。對照到後來的韓國女工未婚者多，一下雨就想休息，回國前都說不想再來砍蔗了，但之後還是再過來賺錢；台灣女工已婚者較多，非常勤勞，下雨天照樣工作，回國時都說還要再來做。

70 多歲的淺沼是當地的蔗農大地主，蔗園面積很廣，最多曾同時雇用 18 名台灣女工，也做過「勞務募集委員」到台灣招募女工。他斬釘截鐵地說，台灣女工都沒什麼休息，就是想多賺，女工們彼此也會自行分配工作，更有效率、賺更多。至於後來雇用的韓國女工都不能信任，也不夠勤快，互相常吵架，還出現女工懷孕自殺的命案，弄得當地雞飛狗跳、雞犬不寧。

臉上始終堆滿笑容的典子 50 初頭，她的娘家也是當地數一數二的蔗農，小時候家裡每年都會雇用到 13-15 名的台灣女工，她回憶這些女工有多麼勤奮，下小雨也照樣出去工作，只有下大雨或糖廠洗車時才會休息。相對地，後來雇用的韓國女工抱怨就很多，還經常嫌提供的食物難吃、不好吃、不能吃，傍晚早早就回到宿舍，不像台灣和宮古島來的女工都賣命做到天黑才返回休息。

新城已是白髮蒼蒼的 60 幾歲老翁，25 歲時母親剛過世，他必須一人照顧 2 萬 5 千坪面積的蔗園，每年雇用 4-5 名的台灣女工，對她們勤奮工作的印象極其深刻。但對於後來的韓國女工則頗有微辭，覺得韓國人喜歡說謊，謊報自己的學歷，又經常批評日本蔗農家如何不好，當時他也曾用簡單英語回罵她們。

（二）向被殖民者學習

對南大東島島民而言，台灣女工除了是一名勤奮的勞動者外，她們還有個共通的特質：節省，這個特質最常展現在女工對於三餐食材的選用上，但對島

募台灣移工，但法律並不允許，當時日本的〈勞動法〉並不接受無技能的單純外勞，引進韓國的季節性勞工也是基於〈沖繩復歸特別措施〉這個法條下的例外（藤野雅之 2004）。

民來說更有趣的是，「省錢」達人此一形象竟然和「採草」達人相互連接，也是受訪者口中直說要「向台灣女工學習」之處。

沖山說台灣女工都很節省，蔗農家給她們一天的食材錢是固定的，但她們都努力省下來，盡量吃得簡單，認為多出來的錢也算是賺到。同樣地，新城回憶家中雇請的台灣女工就是節省，每個月固定給她們的食材費都努力省下來，說是要存錢帶回台灣。但對蔗農家來說，這筆錢不是要她們拿回國的，如果女工沒有體力、沒了健康無法工作或導致效率不佳時，對農家而言損失更大。

典子的父親晚上會出去海釣，當地有一種叫做「インガングルマ」的夜行性深海魚，禁止販賣，但允許自給自足。父親通常只吃魚身，魚頭部份就會扔棄，台灣女工卻把魚頭揀來煮食，這種魚吃多了皮膚表面會排出油份，味道很臭，或容易引起肚瀉腹痛，她們偶爾會覺得不好意思，但知道此乃珍貴魚肉也就不以為意了。典子也發現台灣女工都很節省，每回拿料理食材給她們時，都說「還有，還有，不用沒關係！」絕對不浪費，強調這是日本人要向台灣女工「學習」之處。

那麼，「省錢」達人此一形象，又如何與「採草」達人相互連接呢？

奧山是 70 多歲的電器行老闆也兼賣些成藥，當時不少台灣女工也去光顧，他認為台灣女工可能是貧困才如此節省，她們絕不奢侈（相對地，他就曾聽說韓國女工常喝牛奶），經常出去採野草、藥草、木耳來吃，或煮成當藥湯喝，女工覺得天然食物對身體比較好，但基本上還是因為節省。¹²不只奧山，其他受訪者也都強調台灣女工採草藥的本領，伊佐、淺沼知道家中雇用的台灣女工空閒時會去海邊等地摘野草，枸杞、薄白磯松（*Limonium wrightii forma albolutescens*）等，南大東島本身就是很多野菜藥草的天國（東和明、中井精一、ロング 2009），女工把它們拿來當食材炸成天婦羅或曬乾做成中藥，有的可能也帶回台灣。典子也目睹台灣女工以野草做菜，直說從她們身上「學習」到不少，譬如，枇杷葉、木耳、犬酸漿（*Solanum nigrum*）等都拿來做菜用。整體而言，島民認為她們此舉可能是為了節省菜錢，但對於女工具備野菜、藥

¹² 雖說台灣女工在節省中不忘消費，但所謂的消費仍是有限的，是一種非日常性、非經常性的，只在休息或回國前夕才會從事，終究，在島民眼中她們還是超級的省錢達人。博子是奧山的太太，她回憶曾有台灣女工拿戒指來換藥，就是物物交換，女工希望多拿些現金回台，加上當時的現金就是美金，但沒多久換到的那只戒指就斷開了。她也發現，女工們會故意把新買的電器產品包裝成二手貨或弄成已經開封使用過的，這樣帶回台灣才可免稅，而且女工很會殺價，只有在買藥時比較節制不會亂砍價，她們可能認為藥品越貴對身體越好吧。

草的豐富知識，還是不斷地「嘖嘖稱奇」！

然而，台灣女工並非只會一味的在餐桌上節省或是外出採買錢的野菜，她們也有展現消費能力的一面，成為當地店家歡迎的客源。沖山回憶說，通常要等到糖廠清洗機械停工時，砍蔗女工才能休息，以前洗機械是固定的，所以她們的休假也是固定的，20 天清洗 1 次，她們也就 20 天才休息 1 次，那時候女工們會抽空出去買買東西，街上變得熱鬧，店家也有得賺。涼子母親開的百貨商店已經在南大東島屹立了 40 多年之久，當時她還只是個中學生，她回想著說，因女工們白天都在田裡忙砍蔗，幾乎是晚上店家關門後，直接到家裡來挑貨。涼子的母親是現年 76 歲的老闆娘正子，她的店也是資生堂用品的專賣店，40 年來連招牌、看板、櫃檯都沒換過，資生堂的化妝品保養品一直是台灣女工的最愛。¹³她還依稀記得一些簡單的閩南語（譬如女工常買的養命酒），她說台灣女工很會照顧肌膚，出去田裡砍蔗時，從臉部到手臂都會包地緊緊的，南大東島當地的女性也開始「學習」她們的保養工夫。

（三）和被殖民者的家人情誼

如前所述，台灣女工除了是當地男性愛慕或幻想的對象外，不可忽略的是，也有蔗農把女工當成自己的姐妹或女兒來看待，可以說，她們彼此間確實存在著擬似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是女性之間尊重和充滿情愛互動的情誼，特別是對那些尚在年幼或青春期的女性蔗農子弟來說，女工的存在，也是她們成長記憶裡的重要部份；此外，和台灣女工之間有如「家人」般的關係，也是女性受訪者屢屢強調的，特別是展現在食材的提供以及日常的嘘寒問暖。

羊子、典子、輝子都已是 50 歲左右的婦人，當年都還是年幼的蔗農子弟，台灣女工住在和自家同一塊庭院內的宿舍，只是不在同個屋簷下，小女孩不僅可以就近觀察到她們的日常生活，而且和家中雇請的台灣女工之間是有真實互動的，地點不是女工揮汗如雨的蔗田，而是在自家的庭院、屋內或女工的宿舍裡。典子是受訪者中對台灣女工回憶最多且最深刻的人，她感性而滔滔不絕地訴說著，台灣女工如何地疼愛她，和她父母也像「家人」一樣地互動，用情極深：

¹³ 女工們回國前，佳麗寶的毛線、自動折傘、征露丸、曬乾的昆布、魷魚等是常買的紀念品。來到奧山電器行兼藥局的女工，大多利用晚上才來家裡選貨，平日會去買中將湯、養命酒、命の母、武田合利他命等保健食品或飲品，甚至有人要求皮下注射安瓶（*ampoule*）藥劑。回國前女工也買些電鍋和電熱瓶，更指名採購當時最夯的 SONY 收錄音機（*radio-cassette*）當回國禮物，還會嫌棄聲寶牌（SHARP）或國際牌（Panasonic）的品質不夠精良。

「她們常用麻油炒菜，很香很好吃，負責燒菜的女工總會叫我『呷飯啦，典子！』我對台灣女工印象非常良好，她們的存在，是我童年少年時期非常重要的記憶。1972 年之後，知道她們不能再來時，我很難過地一直問父母：她們為什麼不來了呢？每次她們回台灣，我都會去港口送行，邊送邊哭看著船開走。……

有時候，我會去她們宿舍做功課，女工們也順便學點日語，星期日我不用上學，會去宿舍找她們玩，我沒有姐姐，所以都把她們當成自己的姐姐，還跟她們一起在蚊帳裡睡覺呢！

有個台灣女工和當地日本男工發生戀情，後來未婚生子，她們約會時，我還曾經去當過電燈泡。……回國後她們曾寄椪柑、蜜餞來給我父母，這是島上很希罕的食物，我拿到學校請小朋友，感覺很得意呢。」

（訪談記錄，典子 2010）

淺沼的太太已年過 70，她不疾不徐地回憶說，自家蔗園面積很大，最多時雇用了 18 位台灣女工，她覺得未婚者通常比已婚者較勤快，能做且肯做，當時有位彰化出身的女工叫美玉，都暱稱她「姉さん」（姐姐），至今也仍保持聯絡，每次人到那霸都還會打電話來。當時因為還沒有冰箱，她經常會送女工自己醃漬的鹹豬肉，也送她們些魚肉蔬菜當食材，或是自己做的魚壽司給她們吃，女工都很高興什麼都吃、從不挑剔。

典子提到她的父母每個月會在家裡舉辦「營養會」或「慰勞會」，準備豐盛的美食犒賞台灣女工的辛苦，雖然她們五音不全或日語不太靈光，卻也在餐會上賣力唱日本歌、自娛娛人。真的彼此像「家人」一樣互相體諒，女工都叫她父親「頭さん」（應該就是閩南語的頭家之意），遇到天氣寒冷或是下霪時，母親也會先在屋內升火，等她們下工回來就可以馬上取暖。

同樣地，將台灣女工看做自己女兒的是伊佐的母親，她已高齡 85 歲，指著一張泛黃照片中的 7 名女工，清楚記得中間笑地很燦爛的 3 人是來自雲林縣，當年都還小也未婚，而且 3 年連續來家裡砍蔗。伊佐的母親不斷強調，彼此就像「家人」一樣，照片是甘蔗採收結束後在家舉行的慶祝餐會，大伙座在榻榻米上用餐，桌上擺著沖繩當地著名的水果飲料「バヤリーズ」，也是考慮到年輕女工可能不勝酒力吧。

以上從「稱讚被殖民者」、「向被殖民者學習」、「和被殖民者的家人情誼」三點，捕捉了島民眼中台灣女工的不同身影，多數受訪者不是蔗農及其子

弟，就是店家的老闆，從他們立場觀察到的台灣女工雖是片面，但仍有一定程度的寫實。回到本文的主軸，在「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視角的映照下，台灣女工有哪些身影，和《東方主義》、《魚群記》書中的描繪相仿，與女性的肉體身體、男女的性愛交歡有關，仍被置於充滿權力宰制的不平等關係裡？又有哪些身影，則與權力位階差序並無太大關連，而是自然而然地被鑲嵌在「被殖民者 vs. 殖民者」、「送出國 vs. 接受國」、「雇傭 vs. 雇主」、「女 vs. 男、女 vs. 女」等國族、族群、階級、性別組合的天羅地網中呢？為什麼？有以下兩點發現：

(1) 不同的島民對於女工有不同的凝視，先從受訪者的「性別」來看，因受訪者的性別不同而相異，可以看到，和《東方主義》、《魚群記》中描繪的場景相去不遠，男性受訪者將台灣女工當成愛人而產生性幻想之事確實存在，相對地，女性受訪者則呈現較為溫潤的一面，展現如家人般的姐妹情誼。再從受訪者的「身分」著眼，對蔗農及其子弟而言，台灣女工的作息時空其實是被圈限的，她們的日常生活幾乎都在蔗園、宿舍兩地來回穿梭（後詳述），只有在特定的休息時間，才會現身於街上或店家，和一般島民的接觸很少。因此，蔗農及其子弟所觀察到的女工身影算是最頻繁的，無論從勤奮的勞動者到省錢達人，或是從愛人到家人。清楚看到的是，蔗農對於台灣女工多麼「讚譽有加」，所謂勤奮的勞動者此點非常符合蔗農的初衷與利益，也就是以較低廉的工資，雇用到比當地人便宜又勤快的勞動力，而且很少休息任勞任怨。特別是與 1972 年之後引進的韓國女工相比，韓工動輒想休息、不夠勤快等低落的勞動意願與狀態，都令生產者的蔗農搖頭嘆息，也因此，台灣女工的勤奮努力，更加讓他們難以忘懷、再三肯定。至於店家老闆的凝視又是另番光景，台灣女工去到店家買東西雖是非日常性、非經常性之事，但在商言商，基於對消費者的禮貌，店家老闆不太可能採取冷淡或否定的態度，對於女工採買時省錢、挑剔、殺價的態度，記憶猶存。(2) 最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女工「節省不浪費的態度、採藥草的技術、防曬護膚的好習慣」等，都成為當地人嘖嘖稱奇、學習仿效的對象，此點打破了《東方主義》中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或是強勢者對於他者女性慣常性地扭曲地再現，相反地，它呈現出另類的可能翻轉，凸顯了殖民者並非全然高高在上，也有意願向被殖民者學習的一面。

六、台灣女工回望的南大東島島民

為了凸顯 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本文不僅從南大

東島島民的角度凝視台灣女工，同時，也要從台灣女工自身的立場出發，到底，她們如何詮釋自己的跨國生命經驗、又如何地回望這些島民？

提到關於蔗園或農莊女工的先行研究，從被殖民者被壓迫者的處境著眼（Jain and Reddock 1998），或是從被殖民者被壓迫者的反抗出發（Camp 2003），到強調女性移工的主體性建構等積極觀點（White 1999；宮本なつき 2007），不一而足。

譬如，Shobita Jain 和 Rhoda E. Reddock（1998）關注始於 16 世紀中葉的農園這種制度與空間，這是伴隨西班牙、英國、荷蘭、法國等歐洲殖民勢力擴張後，在其熱帶和亞熱帶殖民地廣建的農園型態，農園的種植作物包括甘蔗、茶葉、橡膠、煙草、棕櫚等，隨著 4 百多年來的時空演變，農園內的管理營運、主從、雇用，包括從奴隸制到奉公契約制（indentureship）、人際互動等也多有更迭。書中有處理到「跨國遷徙的女性移工」，譬如，在牙買加的黑人女性奴工、在千里達和斐濟的印度女工，她們毫無選擇地被擺放在殖民與後殖民的歷史情境下，這些低教育、低技術、被圈限在有限勞動空間的女工，難以脫離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父權制的夾殺。

Stephanie M. H. Camp（2003）描繪美國南北戰爭（Civil War, 1861-1865）期間女性黑奴在農場的日常反抗，像是無故缺席、偷竊、非法組織、破壞規矩、吐露心聲、逃跑等行為，該書試圖跳脫二元對立的概念，諸如個人與政治（personal vs. political）、物質與象徵（material vs. symbolic）、組織性與日常性的反抗（organized rebellion vs. everyday resistance）、適應與反抗（accommodation vs. resistance），去解讀女性黑奴反抗行動的可能意涵。

還有 Deborah Gray White（1999）試圖打破從白人信仰（Caucasian belief）衍生出來對蔗園女性黑奴的諸多刻板印象，像是無恥查某（jezebel）、雜種（sambo）、白人小孩的奶媽（mammy）等，透過女性黑奴的自我述說、南方白人的日記傳記等資料，還原農園中女性黑奴真實的日常生活、工作、家庭角色及女性網絡的運作，其目的方面強調她們身處邊緣、邊境的奴隸世界之陰暗，但也不忘聚焦女性黑奴展現其主體性的可能。

以積極觀點凝視蔗園女工的是宮本なつき（2007），她處理 1920 年代夏威夷歐胡島（Oahu Island）甘蔗園的日本女性移民參與當地罷工的過程，該文指出，女性移民的相關研究雖然也承認她們是一名勞動者、是薪資所得的擁有者，但大多只關注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傳統角色與貢獻，女性移民所發揮的社會功能、

參與勞工運動、工運中女性移民的位置等議題，並未受到太多的注意。因此，女性移民不僅只是為家族犧牲奉獻，也非一味地服從權威，她們如何走出家庭，與外在世界做更有意義的連接，都是要突顯的嶄新面向。

那麼，要追問的是，這些來自蔗園或農莊女工的反抗甚至積極的主體性建構，是否也曾發生在南大東島的台灣女工身上呢？

本研究中受訪的嘉義縣大林鎮 8 位砍蔗女工（表 4）對於 3、40 年前的往事不一定想對人訴說，除了完成「賺到錢」這個夫家期待的重要任務外，也不覺得跨海之行有什麼特別深遠的意義，當筆者問到她們對於旅程、旅地、島民的想法看法時，其回答更是含蓄、甚至略顯貧乏，和前述南大東島島民對於台灣女工的多元凝視相比（勞動者、省錢達人、消費者、愛人、家人），明顯平淡很多。為什麼？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女工本身的背景條件使然，一是和女工在南大東島的實際生活有關。¹⁴

表 4、大林鎮受訪的砍蔗女工

化名	受訪時間	年齡	教育程度	居住地	去南大東島的時間
阿紫	2006/05/09	76 歲	不識字	明華里	民國 57-60 年
	2009/11/10	79 歲			
阿蟬	2006/06/23	72 歲	不識字	上林里	民國 57 年 2 月
	2009/10/20	75 歲			
遂女	2008/05/20	83 歲	不識字	明華里	民國 60 年
淑美	2009/10/13	80 歲	不識字	三村里	民國 58 年
金葉	2009/11/03	65 歲	小學一	上林里	民國 67-68 年左右
素錦	2009/11/17	72 歲	不識字	上林里	民國 58-69 年
秋茶	2009/12/08	77 歲	小學四	明華里	民國 59 年 1 月
真真	2010/05/18	61 歲	不識字	中坑里	民國 70 年左右

說明：依受訪時間順序排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首先，出在女工本身的背景條件，重返 1960-1970 年代那個保守封閉的台灣社會，一位目不識丁的貧困農村已婚女性，要想長距離的向外移動，甚至漂洋過海出國，談何容易。她們來沖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在短期內賺到較多的錢，所有受訪的女工都是為了脫貧，也就是為了改善夫家的經濟狀況而向外移出。

¹⁴ 除了個人的背景條件外，地利條件也有影響，石垣島上鳳罐工廠台灣女工的生活就較為多彩多姿，她們和異文化人事物的接觸機會也較多（邱淑雯 2011b）。

而且，她們均為已婚者，心繫台灣的夫家及其子女（邱淑雯 2011a），不識字也不諳日語，和當地工人或一般島民的互動，以比手畫腳、雞同鴨講居多，和頭家也就是蔗農的溝通也差不多，仍得透過翻譯或筆談。因此，女工們大多強調在島上最快樂、最興奮的事就是領薪水而已，對於其它與此無關的人事地景物，似乎沒有太多餘心、餘力關注，也或許根本沒有興趣。

其次，這和女工在南大東島上「停留期間過短」、「生活作息封閉」等實際體驗密不可分。¹⁵女工在沖繩的時間並不長，通常是從年尾到隔年的 4、5 月這段期間，也就是配合冬季甘蔗採收的季節而停留，頂多 5、6 個月，少則 2、3 個月。其次，是生活作息封閉，她們一天的作息是在蔗園、宿舍兩地間來回穿梭，生活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和同樣身為女工的台灣人綁在一起，朝夕相處。聲音清脆、滿臉笑容的阿蟬，回想她在南大東島一天的生活：¹⁶

「主要就是剉甘蔗，有的甘蔗容易剉有的比較難，這也影響甘蔗剉的把數，也就影響到妳賺多少，甘蔗田是分區域的，工人要排隊等，看被分配到哪一區剉甘蔗。下雨天要除草不能休息，我也不想休息，有做就有賺。……

許多年輕的女工 20 幾歲不會做事，她們就賺得少，有時連生火煮飯都不會，只是幫倒忙，生火變熄火，看我煮飯就在旁邊打盹愛睏，乾脆我自己來做還比較快。早上兩個人一組先起床，要做 18 人份的早餐，順便包中餐的便當，晚上則是一個人天黑前先回工寮煮晚飯。……我和同村的阿欠通常比較晚回來，所以也比較晚吃飯，因為兩個人有伴不怕黑，別人下工了，我們還繼續在甘蔗田摸黑做到 6、7 點，晚上吃完飯後，別人都早早躺平休息了，看到我們都問說：妳們倆人怎麼做這麼晚啊！？老闆是算你砍多少把甘蔗才給你工錢，所以我們就

¹⁵ Samuel Martinez (1996) 研究多明尼加蔗園中來自海地的底層移民在 Batey (sugar workers' town) 此一空間內的生活。

¹⁶ 飯田収治 (1991, 1992) 聚焦在 20 世紀初從東歐遷徙到德意志的短期農民季節性移工，主要是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這些位於德意志農村社會最底層的外來者，延伸了在故鄉的習慣與人際關係，無需多花時間或精力去適應、去理解德意志這個新環境，當然，他們可能也沒有意願或能力。他們在封閉又隔離的「營舍」空間中，集體共同生活好幾個月，那裡也宛如是個保護膜，唯一能外出的是星期日到教堂做禮拜，順便買東西和同鄉交換資訊，算是單調打工歲月中的小點綴。移工和當地社會的積極接觸幾乎沒有，當地人對這些外來者卻多投以鄙夷不悅的眼神，他們的口音、服裝、長相、群聚路過的樣子，無一不被嫌棄，所以移工中有不少人是帶著「反德情緒」回國的。

努力砍了。」（訪談記錄，阿蟬 2009）

還有，不得不提的是，去南大東島當砍蔗工的她們，訪談中多次異口同聲地強調，這是一趟不折不扣的「苦工旅行」。剉甘蔗的辛苦、勞苦與痛苦，占去了女工絕大多數的時間，耗掉了她們最好的體力，當然，這也影響到她們是否有餘心、餘力和餘情，再對周遭的人事地景物產生太多的關注。

阿紫不假思索地回答：「為了賺錢才過去的，去那邊是生死門，不是養生堂耶！」以女工在當地最主要的工作「剉甘蔗」這件事來看，雖然她們在大林就做過這些農事，算是駕輕就熟，但阿紫仍感嘆地說，腰酸是常有的，因為剉甘蔗時得蹲下去再站起來，背痛、手痛是家常便飯，自己從台灣帶了鐵牛運功散來吃；還有燒完甘蔗後，全身燻地黑黑髒髒的，味道去不掉不說，也很難完全清洗乾淨。阿蟬回想著所謂痛苦的事，就是手腕關節因剉甘蔗弄到疼痛發炎，貼撒龍巴斯也沒用，頭家還找人幫她按摩，但越按越痛，只好忍耐地邊做邊哭。說話慢條斯理地淑美吐露，去沖繩都是年尾的冬天從台灣出發，在當地剉甘蔗時天氣忽冷忽熱，早晚雖然很涼，但中午大太陽底下真地很難熬，手指都做到皸裂；還有一次眼睛被紅甘蔗刺痛，頭家帶她去診所洗眼睛，不僅價錢昂貴，還差點把眼睛弄瞎了！金葉也提到剉甘蔗導致手痛的事，晚上睡覺前整隻手幾乎僵硬，又麻又痛難以忍受，也不知是太冷、水質不好還是疲勞過度，其實上工時都有戴手套，但似乎並沒有改善。

綜觀「女工本身的背景條件」及「女工在南大東島的實際生活」兩點之說明，可以推測女工的異文化體驗也就是「旅者對於旅程¹⁷或旅地中人物、事物、景物所產生的感受、感覺及感知」，可能極其短暫且零碎，足以用「隨風而逝」四字來形容。也因此，很難（或遑論）會出現上述蔗園或農莊女性先行研究中所提及的，來自被殖民者被壓迫者的反抗（Camp 2003）乃至積極的主體性建

¹⁷ 女工對於旅程的感受似乎是「痛苦」居多，因早期都是從基隆港搭船到沖繩，1970年代晚期之後才有搭飛機。秋茶回憶說好多人都暈船，船艙內不時怪聲四起，她都不想待在那裡。阿蟬是村裡面最早一批過去的開路先鋒，她記得先到基隆港集合，經過五天四夜才抵達沖繩，暈船吐得厲害頭也很痛，非常疲累卻睡不著，日本小孩拿便當過來時都沒吃，全倒在海裡餵魚。同行者中有人暈船暈到斷氣，想乾脆跳海去死算了，在船上要上廁所還要別人攙扶，本來回程想坐飛機，但要好幾千元實在太貴了，而且船票是頭家出錢，只好忍受又再暈了一次，這也是她不想再去沖繩打工的原因。不同於早期出國者得忍受暈船的難熬，金葉是晚期才過去的，所以是先坐飛機到那霸，再轉乘 18 人座的小飛機去南大東島，來回總共四趟都是搭機，她說到了中正機場登機口看到長長的紅地毯時，既驚訝又興奮，才知道原來那就是登機坪了，以出國帶來「大開眼界」一事，這算是女工口中少數「正向的」詮釋。

構（White 1999；宮本なつき 2007）等情況。那麼，在她們與南大東島島民或蔗農極其有限的接觸過程中，筆者到底能捕捉到她（他）們之間的什麼凝視、互動與關係？又，這個關係如何擺在本文的主軸——「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視角底下呢？可從「陌生的島民」和「親切的頭家」兩點來看。

阿紫聳聳肩幾許無奈地說，曾聽過沖繩人罵女工是「台灣豬」，但又能怎樣！她也略帶輕蔑地吐說，「阿球語」她聽不懂，也沒有和當地人交流，「阿球仔」愛喝酒衛生不好，看起來髒髒的鬍鬚很長，好像很懶惰，生活也不太好。阿蟬說輪到她煮晚飯時，得提前離開蔗園，回程路上會碰到開甘蔗火車的日本人，常常邀她搭便車載一程，但不會日語的她，連頭家的人名地名都不知道，只能跟他搖手，真是可惜啊（露出惋惜的表情！）淑美淡淡地提及，她沒碰過什麼其他男工或女工，因為是住頭家那裡，也沒機會認識什麼人，當地都是老人，年輕人都外出工作了。真真直說除了蔗農的家人和司機外，她幾乎沒有見過當地的男性，只有一次晚上去糖廠的路上巧遇，但心裡覺得害怕，後來沒有再出門，也很少再碰到。

可以想見，因為「聽不懂、不知道、沒機會或心生害怕」，女工和當地人的接觸真得很少，對於當地人的觀感，只能說是陌生而遙遠。頭家也就是蔗農家，或許就是她們在沖繩停留期間主要看到的「外國人」，因為女工的作息都在蔗園、宿舍兩地間來回穿梭，女工宿舍通常就蓋在和蔗農家屋同一塊的庭院內，每天進出多少都會碰面，那麼，站在女工的立場，如何感受到蔗農的對待、如何去觀察蔗農與她們的互動呢？主要展現在以下兩點：蔗農對於她們「平日的食材提供」，以及蔗農對於她們「收工後的休閒安排」。

首先，在平日的食材提供上，阿紫的頭家抓會下蛋的土雞給她們加菜，偶爾請吃大餐慰勞一下，下午還準備香蕉、點心、餅乾、茶水給女工吃。阿蟬不經意露出喜悅而肯定的表情說，在那邊下午都有點心可以吃，頭家泡好整壺咖啡隨你喝，最棒的是酥酥脆脆的牛奶餅乾，回國前半個月她都捨不得吃，打好回國後，分送那些來看她的村人和小朋友；有時下午的點心是咖哩麵，沒有碗可以盛裝，就用葉子當餐盤用，那邊的清潔衛生也都很好。頭家平常給女工的食材不錯，蘿蔔很大很長她拿味噌去醃漬，頭家的兒子開船去海邊釣旗魚，他們自己吃生魚片，剩下的魚肉魚頭就給女工，她拿來煎一煎把魚頭炸地酥酥的，再放白蘿蔔下去煮湯，旗魚會出油很好吃，當便當的配菜也很新鮮。回台前一晚，頭家殺了頭羊犒賞所有女工，回台當天送每人一盒便當外加蘋果一顆，

是當時最好最稀罕的。秋茶的頭家也會拿傍晚港口卸下的鮭魚頭給她們煮湯，或是拿雞蛋及整桶的味噌送她們。真真說她的頭家人很好，女工宿舍是旅館改建的，房間廚房都很大，比自己在大林三合院的土角厝還舒適，頭家娘拿自己種的蔬菜或豬肉給她們煮，過年時加菜，平常女工也會要求買豬皮，因為比較便宜。

再則，是收工後的休閒安排，阿蟬頭家的兒子偶爾晚上會載她們去看電影，分給每人 1 角美金買電影票，她一次也沒去，把所有的錢都省下來。金葉回想她去到的那邊也沒什麼人煙，都是小山丘，頭家開車載她們環島看看，或偶爾到很遠的市場大街逛一下。秋茶的頭家娘有空會跟她們聊聊天，譬如說當地女人做月子是吃粥不吃飯，配青菜和醬菜，和台灣吃麻油雞不一樣；頭家也會載她們去其他蔗農家工作，順便一起吃飯聊天。真真說她的頭家晚上會請司機開車帶她們去外面溜達，當地並不熱鬧，常常是有路走到沒路。曾經到過沖繩兩次的淑美，娓娓道出她對蔗農家的回憶：

「頭家和頭家娘人都不錯，常常跟女工聊天黑白吐，還會幫我們寫信給台灣的家人。會社洗車（糖廠清洗機器）時，我們就可以休息外出了，頭家會帶去街上逛逛，不過南大東島的市街比大林還小，也不太熱鬧，沒什麼好看的，有錢也沒地方花，沒買什麼東西。倒是頭家第一次帶我們去電影院，我就在門口撿到 1 元美金，如果是 10 元那就更好了，當時還沒開始剉甘蔗呢，真地很開心！」（訪談記錄，淑美 2009）

以從上「陌生的島民」和「親切的頭家」兩個面向，掌握了台灣女工眼中南大東島島民的身影，再回到本文的主軸，從「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視角切入，台灣女工是否有哪些身影，和《東方主義》、《魚群記》書中的描繪一樣，與女性的肉體身體、男女的性愛交歡有關，仍被置於充滿權力宰制的不平等關係裡？而又有哪些身影，則與權力位階差序並無太大關連，而是自然而然地被鑲嵌在「被殖民者 vs. 殖民者」、「送出國 vs. 接受國」、「雇傭 vs. 雇主」、「女 vs. 男、女 vs. 女」等國族、族群、階級、性別組合的天羅地網中呢？研究發現：

（1）首先，從女工的口述當中，聽不到與女性的肉體身體、男女的性愛交歡有關的任何內容，即便在訪談中，筆者也曾含蓄地提問。究其原因可能出在當時她們大多都是中年的已婚者，受訪者遂女甚至已經做到阿嬤，加上島上生

活作息封閉、砍蔗工作辛苦，要發生這些事的機率是很低的。此外，即便真的發生過，和南大東島的男性受訪者相比，這些高齡女工願意（會膽敢）侃侃而談者，恐怕也不多。（2）其次，和前述「南大東島島民眼中的台灣女工」雷同的是，不同的女工對於島民有著不同的回望，有人覺得受到歧視，認為島民骯髒懶惰，乃至心生恐懼；但也有人認為當地衛生清潔還不錯，住的屋舍比大林老家還好，基本上女工對島民的印象是陌生而遙遠的。（3）女工對蔗農家的評價普遍良好，似乎沒有太多的怨言或不滿，蔗農給予她們平日的食材提供，算是一種味覺的刺激和滿足，女工在辛苦的砍蔗工作之餘，透過飲食及煮食，轉移注意力、也補充消耗的體力，特別是新奇昂貴的食材（牛奶餅乾、魚類、蘋果），對於當時不識字、出身貧困農村的她們而言，是異文化體驗中少有的「奢侈享受」。此點，回應了前述「南大東島島民眼中的台灣女工」所提及的「和被殖民者的家人情誼」，特別是雇主和雇傭藉由食材的提供與傳遞，建立也維繫了一種和平安穩的關係。至於，蔗農對於她們收工後的休閒安排，則是女工跳脫平日作息時空，得以在蔗園、宿舍兩地以外短暫喘息的片刻，電影院、其他蔗農家、市場大街成為她們接觸異文化的稀有機會，但也僅止於蜻蜓點水。

由此推測，雖然女工和蔗農仍無法脫離雇主、雇傭的主從關係，但雙方也未必就存在著如 Shobita Jain 及 Rhoda E. Reddock (1998) 所提的，女工因身處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父權制的夾殺而產生的壓迫關係，台灣女工選擇穩定認份的相處，沒有出現什麼日常反抗的舉動，力求雇用期間彼此的相安無事。那麼要問的是，為何會產生這樣的互動關係？女工之所以採取和蔗農間安穩的相處之道，原因可能出在「女工本身的背景條件」和「女工在南大東島的實際生活」，換言之，她們本身的意願能力以及來沖之後的生活作息等限制，使得她們「不足以」去積極抗爭或反抗雇主的不友善對待。但平心而論，透過「南大東島島民眼中的台灣女工」與「台灣女工回望的南大東島島民」之雙向映照，也可以感受到，女工或許主觀上並未承受來自雇主太多的苛待，因此，也不認為有需要去爭取或反抗什麼壓迫了。

七、結論

本文從「東方主義的再思考」這個視角出發，掌握 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強調不只由沖繩單方片面地再現台灣女工，也不是以女工的有限記憶重返當時的時空，而是同時把握「南大東島島民眼中的台灣女

工」與「台灣女工回望的南大東島島民」之雙重視角，去捕捉哪些曾經存在、卻未被發掘的台沖關係。研究發現：台灣女工的身影是多元的，有的和《東方主義》、《魚群記》書中的描繪一樣，女工的的確確是不少當地男性愛慕垂涎的對象，仍被置於充滿權力宰制的不平等關係；但也有某些身影與權力位階差序並無太大關連，從南大東島島民的立場來看，女工是值得被稱許的勞動者，女工「節省不浪費的態度、採藥草的技術、防曬護膚的好習慣」，也值得島民肯定學習，蔗農和女工更發展出家人般的姊妹情誼；再從台灣女工的角度回望，女工感覺當地人陌生且遙遠，女工與頭家蔗農則穩定相處，沒有日常反抗的舉動，力求雇用期間的相安無事。

必須對照到先行研究，以凸顯本文的貢獻及特色。一言以蔽之，本文以春日直樹編（1999）、Nicholas Thomas（1994、1999）、Mary Louise Pratt（1992）、飯高伸五（1999）、崔吉城編（1994）等人的共同觀點，也就是「如何超越二元對立、宰制與被宰制的固定視角，主張以更多樣、變動、辯證的方式，處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宗主國與殖民地雙方的相互關係」，架構出「東方主義的再思考」此一視角，準此，凸顯了 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可以看到：

（1）不同的島民對於女工有著不同的凝視，無論是從勤奮的勞動者到省錢達人或消費者，還是從愛人到家人；反之亦然，不同的女工對於島民也有著不同的回望，基本上是陌生而遙遠，但對於蔗農家的評價普遍良好。此點回應了 Nicholas Thomas（1999）的主張，承認「各種不同原住民」與「各種不同西方人」頻繁交會的這個事實，透過本文也讓我們清楚看到，確實存在著「各種不同島民」與「各種不同女工」凝視與互動的實況。

（2）值得注意的是，女工「採藥草的技術、節省不浪費的態度、防曬護膚的好習慣」，這些都成為當地人嘖嘖稱奇、學習仿效的對象。此點打破了薩伊德《東方主義》中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或是強勢者對於他者女性慣常性地扭曲地再現，相反地，它呈現出另類的翻轉，凸顯出殖民者並非全然高高在上，他也有向被殖民者學習的一面。

（3）雖然，女工和蔗農仍無法脫離雇主雇傭的主從關係，但雙方未必一定存在著壓迫關係，女工選擇穩定認份的和平相處，沒有出現什麼日常反抗的舉動，力求彼此相安無事，也是女工在這趟跨海苦工旅行中的「自處之道」。此點超越了《東方主義》中二元對立、宰制與被宰制的固定視角，呼應 Nicholas

Thomas (1994) 所強調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的關係不能被視為單純的「壓迫 vs. 抵抗」而已，倒不如看成是超越「壓迫 vs. 抵抗」以外的相互實踐。

最後，「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讓我重新思考台日關係中的其他雜音，「日本—沖繩—台灣」三者間的位階差序確實存在，但箇中「殖民 vs. 被殖民」的關係並非恆常不變，透過訪談所獲得的資料以及研究者隨後的詮釋，都只是這些關係中的間歇漣漪，關係，應該是持續奔流的。

參考文獻

· 中文

Kennedy, Valerie。2003。《認識薩伊德》(Edward Sai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邱彥彬譯)。台北：麥田。

Said, Edward W.。1999。《東方主義》(Orientalism) (王志弘等譯)。台北：立緒。

宋國誠。2003。《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台北：擎松。

松田良孝。2012。《八重山的台灣人》(八重山の台湾人) (邱琮雯譯)。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邱琮雯。2011a。〈離返與性別規範：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思與言》，49 (3)：248-303。

_____。2011b。〈八重山 台灣女工〉。《自由時報》，1 月 28 日，自由廣場版。

· 西文

Camp, Stephanie M. H. 2003. *Closer to Freedom: Enslaved Women and Everyday Resistance in the Plantation South*.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Jain, Shobhita and Rhoda Reddock. 1998. *Women Plantation Worke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London: Berg Publishers.

Lewis, R. 1995. *Gendering Orientalism: Race, Femininity and Representation*. NY: Routledge.

Martinez, S. 1996. *Peripheral Migrants: Haitians and Dominican Republic Sugar Plantations*. Tennesse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 Pratt, M. L.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Thomas, N. 1994.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D. G. 1999. *Ar'n't I a Woman?: Female Slaves in the Plantation South*. NY: W.W. Norton & Co.
- ・ 日文
- 東和明、中井精一、ダニエル・ロング編。2009。『南大東島の人と自然』。鹿児島市：南方新社。
- 飯田収治。1991。「『プロイセン渡り』の季節労働者について—上—20世紀初め、東欧からドイツ農業に出稼をした人々」。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人文研究』、43(7)：503-536。
- 。1992。「『プロイセン渡り』の季節労働者について—下—20世紀初め、東欧からドイツ農業に出稼をした人々」。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人文研究』、44(12)：917-935。
- 飯高伸五。1999。「日本統治下マリアナ諸島における製糖業の展開：南洋興発株式会社の沖縄県人労働移民導入と現地社会の変容」。『史学』、69(1)：107-140。
- 岡田泰弘。2009。「冷戦期の黒人オリエンタリズム：1950年代初期のアフリカ系アメリカ人による日本人女性の表象における人種とジェンダー」。『アメリカ・カナダ研究』、27：45-79。
- 沖縄タイムス。1973。「苦悩する離島進む過疎手さぐりの対策」。『沖縄タイムス』、2月27日。
- 春日直樹編。1999。「オセアニア・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春日直樹編『オセアニア・オリエンタリズム』、5-27。京都：世界思想社。
- 朱恵足。2001。「目取真俊「魚群記」における皮膚色素／触覚／インターフェイス」。『現代思想』、29：18-30。
- 第一製糖株式会社。1980。『第一製糖株式会社20周年記念誌』。糸満(沖縄)：第一製糖株式会社。
- 崔吉城編。1994。『日本植民地と文化変容：韓国・巨文島』。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 外村大、羅京洙。2009。「1970年代中期沖繩の韓国人季節労働者：移動の背景と実態」。日本移民学会『移民研究年報』，15：77-95。
- Thomas, Nicholas (中川理訳)。1999。「美しきものと呪われたるもの：植民地文化における太平洋の構築」。春日直樹編『オセアニア・オリエンタリズム』，31-52。京都：世界思想社。
- 西成彦。2003。「暴れるセラピアの筋肉に触れる」。西成彦、原毅彦編『複数の沖繩：ディアスポラから希望へ』，7-18。京都：人文書院。
- 藤野雅之。2004。『与那国島サトウキビ刈り援農隊：私的回想の30年』。那覇：ニライ社。
- 平岡昭利。1978。「南大東島における甘蔗農業への外国人労働力の導入と展開」。『地理学評論』，51(4)：318-326。
- _____。1992。「サトウキビ農業における外国人労働者の導入と実態」。サンゴ礁地域研究グループ編『熱い心の島：サンゴ礁の風土誌』，125-136。東京：古今書院。
- 南大東村誌編集委員会編。1990。『南大東村誌』。南大東村：南大東村役場。
- 宮本なつき。2007。「砂糖黍畑の女たち：ハワイ日本人移民女性と1920年のオアフ島第二次ストライキ」。『ジェンダー史学』，3：19-32。
- 目取真俊。2001。『沖繩／草の声・根の意志』。横浜：世織書房。
- _____。2003。「魚群記」。『平和通りと名付けられた街を歩いて：目取真俊初期短編集』，7-31頁。東京：影書房。
- 琉球政府労働局職業安定課編。1971。『職業紹介関係年報1970』。那覇：琉球政府労働局。
- 若夏社編。1992。『琉球製糖株式会社四十周年記念誌』。南風原町(沖繩)：琉球製糖株式会社。

The Multiple Images of Taiwanese Female Emigrant Workers in Okinawa Islands from 1960 to 1970 :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Shwu-Wen Chio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grasp the varied positions of Taiwanese emigrant female workers in the Okinawa islands from 1960 to 197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onsidering Orientalism. The research method is an analysis of the view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sland people and female workers. The research has three main conclusions: (1) Different island people had different views toward female workers. They viewed female Taiwanese workers as diligent laborers, money savers, consumers, lovers, and family members. Female workers had various views toward island people too. Generally speaking, the female workers viewed local people as strange and remote, with an exception of favorable evaluation toward sugarcane farmers. (2) Female Taiwanese workers became a kind of “role model” for the island people. The islanders learned from the female workers herb-picking skills, a money-saving attitude, and good skincare habits. (3) Bas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male workers and sugarcane field owners was that of employer-employee, but there was not necessarily oppression of the employees. Female workers behaved with a humble attitude to strive for a peaceful and 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s, and were never rebellious in daily life.

Key words: Taiwanese emigrant female workers, Orientalism, transculturation, acculturation, colonial project